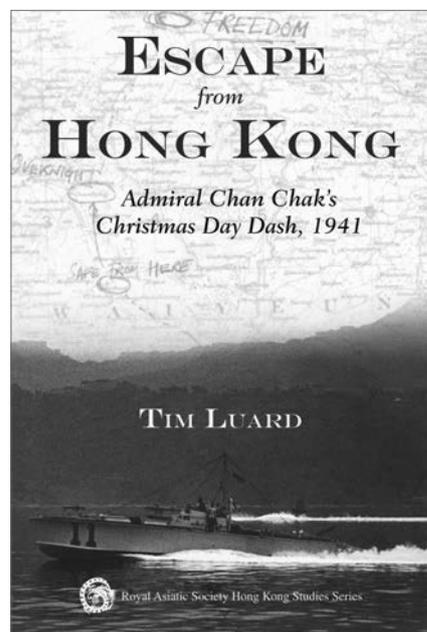


抗戰史的區域角度

——評 Tim Luard, *Escape from Hong Kong: Admiral Chan Chak's Christmas Day Dash, 1941* 和 陳瑞璋：《東江縱隊——抗戰前後的香港游擊隊》

• 鄭智文



Tim Luard, *Escape from Hong Kong: Admiral Chan Chak's Christmas Day Dash, 1941*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陳瑞璋：《東江縱隊——抗戰前後的香港游擊隊》（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2）。

一 抗戰史研究中的區域研究

近年，中外史學界對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角色有更正面的評價。自劍橋大學亞洲與中東研究

院院長方德萬 (Hans J. van de Ven) 在 2003 年出版了《中國的戰爭與民族主義》(*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 以及其相關論文〈史迪威在刑架上〉(“Stilwell in the Stocks”)發表以來^①，學界告別了方氏概括的「史迪威迷思」(Stilwell's Myth)，即抗戰期間的國民政府腐敗不堪，蔣介石對消滅中國共產黨比抗日更有興趣，因此國民黨領導下的中國在二戰中是盟軍的負累，並於 1944 年面對日軍的「一號作戰」(中國方面稱「豫湘桂會戰」)中一敗塗地。雖然方氏認同國民政府腐敗不堪且缺乏效率的觀點，但認為這並不代表國民政府在抗日戰爭中毫無角色可言。相反，國軍精銳自 1942 年以來，在中國—緬甸—印度戰場抗擊日軍，不但有助盟軍穩住印度戰況，更於 1943 年起與英聯邦軍逐步把日軍擊退。他進而指出，國軍大舉增援緬甸戰場的代價就是幾乎在中國戰場被日軍徹底擊敗。國民政府不僅失去湖南等根據地，此戰更影響了戰後國共雙方的態勢。

方德萬的學生、牛津大學近代中國歷史與政治教授米德 (Rana Mitter) 於 2013 年亦出版了《被遺忘的盟友》(*Forgotten Ally*) 以及《中日戰爭》(*China's War with Japan, 1937-1945*) 兩書，深化了關於中國二戰角色的研究，進一步強調中國所作的貢獻^②。此外，學者對於二戰期間各國在戰場內外的互動亦展開了更廣泛及深入的研究。例如民國史大家齊錫生於 2011 年出版了《劍拔弩張的盟友》，詳細討論中國在太平洋戰爭期間與英美兩國的關係^③。2009 至 2011 年間，楊天石等人亦編集了「中日戰爭國際共同

研究」系列論文集，包括關於第二次中日戰爭期間的各方戰略、外交角力、重要戰役，以及地方情況的研究，充實了學界對這次重要戰爭的了解。值得注意的是，該系列即有一卷為區域史而設(《戰時中國各地區》)，可見在相關討論中，區域研究是重要方向之一^④。

關於戰時中國，除了整個中國戰場的戰局、個別重大戰役(諸如淞滬會戰、台兒莊戰役、豫湘桂會戰等)，以及國共衝突以外，學界對中國各地區的戰時歷史亦有所研究。例如，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歷史系教授麥金農 (Stephen R. MacKinnon) 與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教授李友華 (Diana Lary) 等人在 2007 年合編了論文集《戰爭中的中國》(*China at War*)，討論了抗戰期間中國各地區的情況，特別是饑荒、難民等問題^⑤。麥金農又在次年出版了專著《武漢，1938》(*Wuhan, 1938*)，證明區域研究並不會與關於中國整體的研究割裂，反而有以小見大之效^⑥。前述米德在《中日戰爭》一書中對抗戰陪都重慶的詳細討論亦與之相似。

以往討論二戰亞洲戰場的著作大多主要關心以美軍為主的太平洋海空戰與兩棲作戰、中國在大陸與滇緬地區的抗戰，以及英印軍和中美聯軍在印度、緬甸、馬來亞等地的對日作戰。在各大戰區之間的地區如中國華南、中南半島等地在戰爭期間的經歷，則少有成為研究焦點。近年，史家已開始關注這些「邊緣」地區，特別是抗戰期間的華南沿岸和廣東省。例如，麥格理 (Frank D. Macri) 的《帝國爭霸在華南》(*Clash of Empires in South*

以往討論二戰亞洲戰場的著作中，中國華南、中南半島等地在戰爭期間的經歷少有成為研究焦點。近年，史家開始關注這些「邊緣」地區。《逃離香港》和《東江縱隊》以華南為中心，詳細地描述了太平洋戰爭前後華南地區的複雜形勢，以及各方的謀略和合作。

1941年12月日軍侵入香港，在駐港英軍宣布投降前，時任國民黨駐香港代表的陳策海軍中將帶領數十名來自國軍和英國海陸空三軍的官兵以及香港殖民地政府的情報官員，分乘五艘皇家海軍的魚雷艇逃離香港。《逃離香港》主要講述陳策突圍行動的曲折情節，並詳述參與其中的人物。

China) ⑦，以及鄺智文關於日據香港的研究，如《孤獨前哨》、《重光之路》等⑧，均以華南為中心，從細部分析華南在二戰和對日戰爭中的重要性。由於華南地區處於日本本土和東南亞地區之間，在戰略上是日本交通線上的重點，因此在此地發生的戰鬥雖然規模不比其他戰區，但卻同樣具戰略價值。

本文評述英籍中國新聞記者陸雅達 (Tim Luard) 所撰的《逃離香港：陳策將軍的1941年聖誕日逃亡》(Escape from Hong Kong: Admiral Chan Chak's Christmas Day Dash, 1941，以下簡稱《逃離香港》，引用只註英文版頁碼) ⑨，以及前新界西貢政務專員陳瑞璋的《東江縱隊——抗戰前後的香港游擊隊》(East River Column: Hong Kong Guerrillas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After，以下簡稱《東江縱隊》，引用只註中文版頁碼) ⑩，均屬「皇家亞洲學會香港研究叢書」。兩書以華南為中心，詳細地描述了太平洋戰爭前後華南地區的複雜形勢，以及各方的謀略和合作，對於了解戰時香港與華南地區的歷史，以至其在整個中國戰場扮演的角色，均有一定的啟示。本文先就兩書的內容予以簡述，並就它們的學術價值作一評論。

二 《逃離香港》和《東江縱隊》簡述

(一) 《逃離香港》

1941年12月8日(東京時間，下同)，日本為了奪取東南亞的歐

美殖民地，以獲取戰略資源並擊敗已經抵抗逾四年的中國，悍然對英國、美國、荷蘭等國挑起戰火。日軍登陸馬來半島數小時後，日本陸軍第二十三軍已越境侵入香港。12月10日，日軍佔領城門碉堡並陸續突破「醉酒灣防線」(Gin Drinker's Line)的西端，迫使英軍放棄防線，其後更從九龍撤退至香港島。12月13日開始，日軍炮擊港島並實施空襲，然後於18日登陸，雙方鏖戰近一星期後，駐港英聯邦守軍(包括英軍、印軍、加拿大軍，以及來自香港的過千名華人與混血兒士兵)最終投降⑪。12月25日駐港英軍宣布投降前，時任國民黨駐香港代表的陳策海軍中將(抗戰後任廣州特別市市長、廣州綏靖公署副主任)，帶領數十名來自國軍和英國海陸空三軍的官兵(大部分水兵來自屬於義勇軍性質的皇家後備海軍)以及香港殖民地政府的情報官員，分乘五艘皇家海軍的魚雷艇逃離香港，途中曾遇到日艦攔截，但仍順利於26日抵達大鵬半島和國軍游擊隊會合。及後陳策將軍獲英皇頒授帝國騎士司令勳章。

《逃離香港》按時序分為五章，主要講述陳策突圍行動的曲折情節，並詳述參與其中的人物。首章「入侵」詳論包括陳策等主要人物、戰前香港的情況、日軍入侵的經過、英軍特種部隊的部署、中英雙方的聯絡，以及日軍登陸港島後翌日早上英軍魚雷快艇強攻維多利亞港、企圖攔阻日軍登陸的過程。此章指出陳策等人早於香港被日軍入侵前已開始和駐港英軍的情報人員取得聯繫，雙方約定在戰時共同抗日。

第二章「逃亡計劃」詳細交代了英國特勤處 (Special Operations Executive, SOE) 人員簡道爾 (Mike Kendall) 率領的「Z部隊」如何研究和陳策一同逃脫、魚雷艇隊和Z部隊的準備、駐港英軍戰敗投降以及英方通知陳策將軍等人的經過。英軍投降前，駐港英軍司令莫德庇 (Christopher Maltby) 已指示部分參謀和情報人員和陳策一同突圍；海軍亦已準備兩艘魚雷快艇供使用，並於投降前特地通知陳策，要他與英軍人員前往南區乘坐魚雷快艇離開。

第三章「突圍」縷述了陳策一行人於英軍投降之時乘車由市區出發，在日軍追擊下和魚雷快艇會合，再乘艇突圍而出的過程。此章內容最為精彩，宛如小說情節。雖然陳策一行人在途中曾遭日軍攻擊，更和快艇失去聯絡，但最終仍能會師逃出香港。快艇突圍期間曾被日軍軍艦發現，但快艇作勢攻擊，嚇退日艦。

第四章「行軍」承接前章，詳述陳策一行人和黃文虎、梁永元等國軍游擊隊會合後的行動，以及他們在日軍「佔領」範圍內行軍四日抵達國軍據點惠州後受到歡迎等情節。此章指出抗戰中期粵東地區的國軍游擊隊活動、日軍所謂「佔領」範圍的薄弱，以及惠州等國軍控制地區的情況。雖然侵華日軍為數過百萬人，但根本並無足夠兵力控制鄉郊地區，只能依賴附日部隊或任由游擊隊活動。

第五章「回家路上」分述陳策等人回到中國和英國的過程。除了敘述書中各人物的故事外，從此章亦可見抗戰中期，特別是日軍在

1944年「一號作戰」中大敗國民政府前國府控制地區的內部情況。第五章之後有一「後話」，講述書中各人物逃出香港以至戰後的經歷，包括陳策將軍自殺、英國宣傳部在港負責人麥道高 (David M. MacDougall) 在戰後出任民政事務司，指導重建香港等事。

(二)《東江縱隊》

香港淪陷後，日本陸軍在港施行「軍政」統治，史稱「三年零八個月」，成為一代港人的慘痛回憶。日軍據港期間，新界部分地區以及鄰近的廣東省地區仍有各路勢力繼續活動，包括粵南的國軍第七戰區屬下部隊及游擊隊、英軍情報組織英軍服務團 (British Army Aid Group)、中共的東江縱隊、和日軍合作的「偽軍」，以及組成與規模不一的土匪團夥等。在此亂局中，中共的東江縱隊從兩支規模極小的地方民兵逐步發展成為盟軍在廣東其中一支主要的抗日力量，更於日軍投降後數星期內與國軍爭奪廣東省，並嘗試佔領新界。

陳瑞璋的《東江縱隊》亦大致以時序為經，分為七章，分析東江縱隊的誕生、組成、活動，以及成員在戰後的經歷等各方面。陳著雖以《東江縱隊》為名，但該書的討論主題是「抗戰前後的香港游擊隊」，實際上集中討論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 (以下簡稱「港九獨立大隊」)。

書中第一章「引言」交代了中國與華南地區自晚清至1930年代的歷史背景，以及抗戰前共產主義在中國的情況。該章提到華南地區

日軍據港期間，新界部分地區以及鄰近的廣東省地區仍有各路勢力繼續活動。在此亂局中，中共的東江縱隊從兩支規模極小的地方民兵逐步發展成為盟軍在廣東其中一支主要的抗日力量。《東江縱隊》集中討論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

陳瑞璋指出香港淪陷後，港九獨立大隊於1942年初即潛入西貢活動，並陸續在新界北和大嶼山擴充其勢力。在港九獨立大隊的協助下，中共在港骨幹人員以及部分左翼文人成功逃出香港。

族群混雜和械鬥的傳統，以及中共自1921年建立以來的主要發展和在華南的活動。

第二章「東江縱隊的誕生」詳細討論了海外華人支持抗日的背景、廖承志等中共領袖在香港和華南地區的活動、東江縱隊前身「惠陽寶安抗日游擊隊」和「東莞模範壯丁游擊隊」的成立、游擊隊領袖（曾生、王作堯、方方、黃作梅等）的戰前經歷、中共對游擊隊的政策，以及香港殖民地政府在日軍進攻前與游擊隊合作的談判等。此章提到的大部分事件在其他類似著作中已有詳細討論^②，但值得注意的是，陳氏指出諸如曾生、王作堯、方方、黃作梅等早於戰前已在華南活躍，並成功利用香港受日軍威脅的情況促使殖民地政府願意與游擊隊合作，雖然此計劃最終因為日軍進攻而未有實行。

第三章「香港和戰爭年代」講述香港淪陷的經過，林平、蔡國良領導的港九獨立大隊在香港的組織與初期活動、游擊隊救援中共在港人員、親共知識份子以及盟軍人員、游擊隊與英軍的關係、游擊隊與當地人的關係等。陳瑞璋指出香港淪陷後，港九獨立大隊於1942年初即潛入西貢活動，並陸續在新界北和大嶼山擴充其勢力。與此同時，在港九獨立大隊的協助下，中共在港骨幹人員以及部分左翼文人成功逃出香港。至1942年中，英軍服務團成立後曾嘗試和港九獨立大隊聯絡，雖然後者強調自身與中共無關，但英方在國民政府反對下亦未有和港九獨立大隊有太多合作。由於國民政府和英國方面均未有提供支援，游擊隊在戰爭期間主

要依賴控制當地經濟為生，少有對日軍發動攻擊，主要協助收集情報以及人員進出香港。

第四章「游擊隊的組織和活動」繼續第三章的討論，分述港九獨立大隊各部，並討論該隊營救美國第十四航空軍飛行員克爾（Donald W. Kerr）中尉等游擊隊行動（頁76-77）。至1944年春，日軍發動「一號作戰」把國民政府迫至戰敗邊緣，更使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對蔣介石及其政權失去信心。在此期間，東江縱隊趁機在廣東擴大勢力，並以救助克爾中尉等事件拉攏美方。

第五、六、七三章詳論游擊隊自日軍投降以後的經歷。其中第五章「勝利時刻」描述了日軍投降時游擊隊嘗試佔領新界各地失敗的經過，以及因此發生的大嶼山梅窩屠殺事件（頁87-88）。此章亦討論了英國收復香港的過程、英軍和游擊隊合作維持新界秩序，以及殖民地政府獎勵協助游擊隊與英軍的新界鄉民。第六章「內戰、北撤和退伍」則詳述1945年8月以來游擊隊在廣東省與張發奎屬下國軍的衝突、1946年初至6月29日國共雙方談判以至東江縱隊約2,400名官兵乘船北退至山東的過程（頁113-30）。最後一章「革命後東江縱隊的命運」是本書的結語，主要敘述東江縱隊領袖以至一般士兵的戰後生活。

三 簡評《逃離香港》和《東江縱隊》

《逃離香港》和《東江縱隊》均是關於戰時香港的新近著作。自二

戰結束以來，英國、加拿大、日本以及香港和中國大陸學者（及業餘研究者）均完成了不少有關這段時期的著作，這些作品大致可分為兩類：(1)學術研究；(2)側重細節描述的紀實著作。

第一類之中較為研究者熟悉的包括日本防衛廳的官方戰史《香港·長沙作戰》、香港史專家英定國（George B. Endacott，又譯安德葛）的《香港日蝕》（*Hong Kong Eclipse*）、卡文森（Carl Vincent）的《無解》（*No Reason Why*）、英國陸軍上校奧林西（Oliver Lindsay）的《香港爭奪戰，1941-1945》（*The Battle for Hong Kong 1941-1945*）、愛默生（Geoffrey C. Emerson）的《香港拘留營》（*Hong Kong Internment, 1942 to 1945*）、香港大學建築系黎偉聰及其團隊對英治時期香港軍事建築的考察、麥格理的《帝國爭霸在華南》，以及鄺智文、蔡耀倫的《孤獨前哨》等¹³。

第二類著作亦對此題目有重要貢獻，特別是提供了不少學術著作少有提及的人物描寫和事件細節，最為矚目者包括香港史學家高添強和沃爾第（Jason Wordie）的《戰爭遺迹》（*Ruins of War*），香港軍事史研究者布東尼（Tony Banham）的《毫無希望》（*Not the Slightest Chance*）、《里斯本丸沉沒記》（*The Sinking of the Lisbon Maru*）和《受難者們》（*We Shall Suffer There*）等一系列關於香港戰役以及戰俘經歷的著作¹⁴。

以上兩類著作所運用的史料和側重點各有不同。第一類著作多以藏於英、日等國檔案館的解密檔案史料為基礎（特別是麥格理和鄺智文的專著），討論的格局較大，例

如各國決策以至作戰經過，並嘗試重新審視一些對這段時期的既有史識，例如加拿大派兵到香港的原因，中、英、美等國在戰前於華南地區的合作，或是日軍在香港戰役中的表現等。第二類著作則少有以建構或挑戰既有論述為目標，而是以個人經歷為中心，利用口述資料、照片、書信、日記等個人記錄和服役文件等重構歷史細節，但也能對歷史問題的探究提供一些獨特的線索。

陸雅達的《逃離香港》屬於上述的第二類著作，但他幾乎窮盡了有關陳策將軍逃離香港的中英文史料，為以後同類著作設立了極高的標準。他引用的史料來自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英國國家檔案局、香港大學圖書館館藏賴廉士（Lindsay Ride〔又譯賴廉仕〕，英軍服務團司令，戰後成為香港大學校長）文件，以及倫敦帝國戰爭博物館（Imperial War Museum）等，並參考了不少二手著作。記者出身的陸氏亦對戰爭生還者及其家屬進行了大量訪問，並從他們那裏獲取了關鍵的史料。此外，他還利用了牛津大學教授曾銳生在1980年代和麥道高進行訪問的記錄，以及陳策之子陳安國編集的陳策日記（收入《陳策將軍紀念集》¹⁵）等罕見史料。陸氏研究之仔細，從《逃離香港》的附圖解說中可見一斑。他從一幅陳策等人抵達惠州後所攝的大合照中，辨認了全部六十八名相中人以及一隻狗的名字（照片頁，無頁碼）。書中其他照片主要來自生還者及其家屬，大多不可見於檔案館或博物館，彌足珍貴。

關於戰時香港的新近著作大致可分為兩類：(1)學術研究；(2)側重細節描述的紀實著作。第一類著作討論的格局較大，並嘗試重新審視一些既有史識。第二類著作以個人經歷為中心，利用個人記錄和服役文件等重構歷史細節。

正由於《逃離香港》極重細節，因此它不但填補了關於香港戰役和陳策突圍的一些空白，例如作者使用了大量英國海軍的檔案，詳細討論了以往較少為人注意的皇家海軍在香港的表現，此外，對細節的注重更有助研究者了解戰前以及戰爭初期的中英合作。如研究者從倫敦和重慶國民政府的檔案中看當時的中英關係，則很可能會有兩國不願合作的印象。不少關於香港以及日據時期歷史的中文著作均強調^⑥：

《逃離香港》極重細節，因此它不但填補了關於香港戰役和陳策突圍的一些空白，更有助研究者了解戰前以及戰爭初期的中英合作。該書還對戰前的殖民地香港有深入描述，尤其是一般歷史著作少有提及的部分。

中英兩國在戰前互不信任，且英人不信任華人，因此英人既不能和國民政府共同抗日，亦沒有動員本土華人參加保衛香港的戰鬥。更有指英國對日本採取「綏靖主義政策」，同時卻又對自身實力估計過高，輕視日本，在香港防務問題上疏於防範，最終落得被快速擊敗的結局。

可是，近年來如麥格理、費多羅維奇 (Kent Fedorowich)、鄺智文等的研究顯示，由於香港在戰前已被日軍重重圍困，因此英國已分別和國民政府以及中共就防衛香港展開討論，並招募本地華人抗日^⑦。雖然共同防衛的計劃在戰前尚未有共識，但各方在交換情報方面已有合作，例如國軍派員到香港島監聽日本海陸軍航空隊在當地的活動，以及中、英、美官員在香港交換情報等。從《逃離香港》一書中可見，中英雙方在港人員的合作比各國政府之間的合作更為坦誠，而且更有實效，例如陳策協助英軍解決香港島的第五縱隊。雖然最終未能阻止香

港淪陷，但中英雙方的合作卻使重要的情報人員得以逃脫(頁12-50)。

除了為香港在抗日戰爭期間的歷史填補空白以外，《逃離香港》亦對戰前的殖民地香港有深入描述，尤其是一般歷史著作少有提及的部分。這些細節諸如魚雷艇長肯尼迪 (Alexander Kennedy) 上尉和香港輔政司史美 (Norman L. Smith) 女兒之間的戀情、香港的娼妓和駐軍之間的故事、部分殖民地官員顛頑無能等(頁4-8)。而部分「小人物」的個人經歷亦頗具戲劇性，足證歷史之多變無常。例如魚雷艇員亨特 (Alf Hunt) 在1941年12月19日的反擊中坐艇被擊沉，他被俘後先被日軍虐待，然後被送進戰俘營。他在1942年8月被迫登上「里斯本丸」前往日本，又於該船沉沒後奇迹生還。最後，他以九十多歲高齡將其經歷向作者親述(頁46)。

值得一提的是，該書論述了在陳策突圍中成功逃走者在戰爭期間的重要性及其對後來歷史走向的影響。例如，麥道高離港後繼續為香港奔走，於1944年成為英國政府「香港計劃小組」(Hong Kong Planning Unit)的主管，並於1945年9月初抵港出任軍政府的民政事務司，領導重建香港的工作(頁xiv)。討論這些人物，可以顯示個人行為在歷史轉變中的重要性。

陳瑞璋的《東江縱隊》亦大致屬於第二類著作。陳氏主要利用中共在1949年以來累積的關於東江縱隊的文史資料、他在新界出任西貢政務專員時和前東江縱隊的領袖以至普通士兵的訪談記錄，並以香港殖民地政府和賴廉士的檔案以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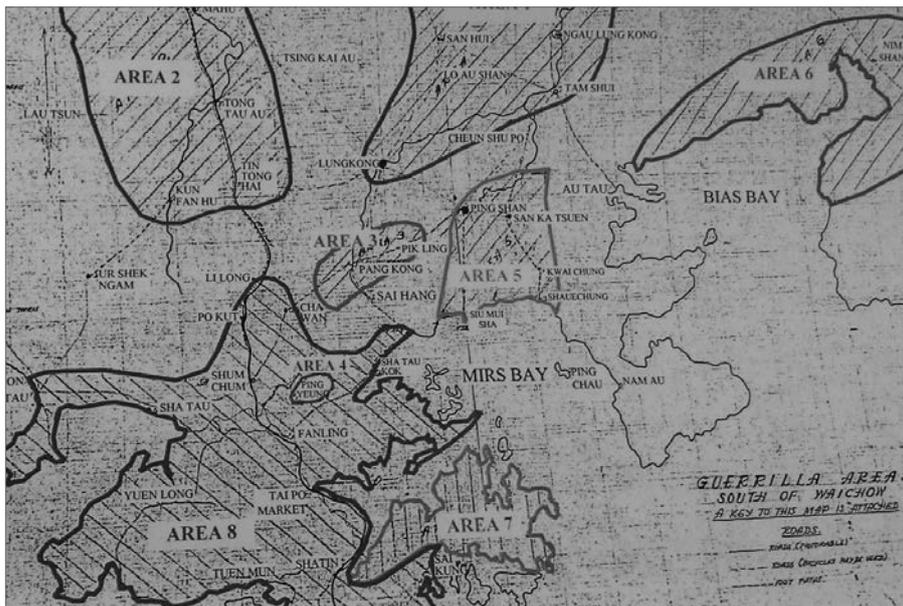
其他中英文二手著作為輔助。一方面，他大量引用中國方面的史料從而深入討論東江縱隊的組成、主要行動以及關鍵人物等內容；另一方面，他利用的其他輔助史料則有助呈現香港歷史的複雜性與多樣性，以及探討各種身份認同的可能性，使該書不至於成為流於片面的歷史書寫。《東江縱隊》利用英國和中共方面的史料，呈現了抗戰期間華南地區國民政府、中共、英國、美國、日本，以及地方力量互相競逐又時而合作的複雜局面，挑戰了簡單的中/日、日軍/盟軍等二分法。

陳瑞璋提到曾有東江縱隊在新界招募的人員承認加入部隊的最大原因是為了保衛家園與出於愛國熱情，並不是為了支持共產主義。他亦提到英軍服務團的何禮文 (David R. Holmes) 曾於1942年8月潛入香港，暗中觀察港九獨立大隊的政治宣傳，發現關於意識形態的教育內容不多 (頁57)。陳氏亦引述了部分生還戰士以及戰時擔任義勇防衛

軍、戰後出任新界民政事務司的彭德 (Kenneth Barnett) 的回憶來支持他的論點 (頁96)。

《東江縱隊》的最後兩章用上不少篇幅討論中共中央以及華南的中共領袖如何以「地方主義」為名鎮壓了方方等前東江縱隊領袖，並提到其他在1949年以後留在中國的前東江縱隊領袖和人員如何在「三反」、「五反」和文化大革命等鬥爭運動中蒙難。從中可以看出中共建政初期的「南北之別」以及黨內不同力量的衝突，亦可看出廣東的中共早期領袖如何從1930年代嶄露頭角，在抗日戰爭期間崛起，然後在中共建政最初二十年內逐漸沒落的過程。陳著亦提到身在戰後香港的前東江縱隊人員大多只能生活在社會低下階層，其參與抗日的角色在1997年以後才得以被香港政府承認。這些細節讓我們對1930年代以迄世紀之交鉅變中的中國以及華人的複雜經歷有更深一層的體會。

《東江縱隊》作者利用英國和中共方面的史料，呈現了抗戰期間華南地區國民政府、中共、英國、美國、日本，以及地方力量互相競逐又時而合作的複雜局面，挑戰了簡單的中/日、日軍/盟軍等二分法。



圖中“Area 7”為英軍服務團在1942年記下的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控制的區域。(圖片來源：Elizabeth M. Ride Collection，香港社會發展回顧項目 [Hong Kong Heritage Project])

《逃離香港》和《東江縱隊》主要利用親歷其境者的回憶來撰述，難免出現因為時人資訊不足或以訛傳訛而造成的事實錯誤。未來研究的主要方向莫過於利用個人回憶以外的史料，特別是中、英、日、美各方的檔案史料，重新審視戰爭期間的華南形勢。

《逃離香港》花了大量篇幅描寫人物，因此全書頗長（英文版內文約有260頁，中文版內文亦長近360頁），但第四章以後所述之事略嫌瑣碎。惟幸陸雅達亦不愧為老練記者，行文不但流暢，而且有不少幫助讀者理解內容的細緻描述，例如對魚雷艇結構和性能的討論；加上陳策等人逃亡的故事充滿曲折起伏，因此可讀性頗高。與此相比，《東江縱隊》全書的篇幅相對較短（中文版內文約160頁），但仍能清楚交代東江縱隊的歷史以及主要人物，節奏較為明快。

然而，由於《逃離香港》和《東江縱隊》主要利用親歷其境者的回憶來撰述，因此均難免出現因為時人資訊不足或以訛傳訛而造成的事實錯誤。例如，《逃離香港》提到城門碉堡失陷時日軍捕捉到英軍在機槍堡中睡覺（實際上當時蘇格蘭士兵被人數佔絕對優勢的日軍突擊，抵抗數小時後才被迫投降）；香港的海防炮台只能向海射擊（實際上可以向陸地射擊，而且亦多次有效支援陸上作戰）；日軍確知香港所有機槍堡的位置（實際上日軍的情報和計劃頗多錯漏，使日軍登陸港島後死傷慘重）等（頁17-20）^⑮。此外，該書第一章把戰前香港描寫成一個不知大難臨頭的城市，英軍甫一抵抗即土崩瓦解，和當時的情況也有不少出入。

《東江縱隊》則提到港九獨立大隊的士兵在英軍投降後到日軍控制下的新界元朗等地收集英軍丟棄的槍枝彈藥，共獲得百枝步槍、五十挺布倫輕機槍等軍火（頁42）。事實上，英軍從未打算在新界北持

續抵抗，只有少數部隊進行遲滯作戰；他們在開戰不久亦有序撤退，似無可能留下可以讓一營（當時駐港英軍只有六營，極需機關槍等裝備）使用的輕機槍。這些來自當時人回憶的數字似乎有點誇張。筆者期望這些描述均可在未來的研究中得到進一步澄清。

此外，在史料運用方面，《逃離香港》雖然提及接待陳策等人的國軍以及其游擊隊，卻少有運用相關史料研究它們在當時的戰略角色，是此書頗為失色的地方。至於《東江縱隊》一書，則主要以中共方面的史料為基礎，其論述亦不免傾向放大東江縱隊成功的內在因素，而且未有詳細討論1944年日軍的「一號作戰」如何破壞了國軍第七戰區在廣東的勢力，致令國軍於太平洋戰爭初期失去在惠州的根據地，使東江縱隊得以擴大勢力，並於翌年日本投降之時佔領了香港以北的部分粵南地區。而且，陳著對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投降至30日英國艦隊抵達香港之間的事件，亦因為未有利用日本方面的資料而沒法詳細交代。

四 小結

兩書為二戰中不同時期的華南情況作出了仔細的描述，為後續研究打下基礎。筆者認為，未來研究的主要方向，莫過於利用個人回憶以外的史料，特別是中、英、日、美各方的檔案史料，重新審視戰爭期間的華南形勢，特別是不同所屬的游擊隊對戰爭的實際影響，包括

它們對日軍或傀儡部隊造成的實質破壞、游擊戰對華南的戰爭局勢和國共雙方勢力的影響，以及戰爭如何促成它們的消長。

總括而言，《逃離香港》和《東江縱隊》仍是讓讀者詳細了解陳策逃出香港、香港戰役前後中英在港合作，以及部分香港近代史人物的好書，值得推薦。

註釋

① Hans J. van de Ven, *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 (London: RoutledgeCurzon, 2003); “Stilwell in the Stocks: The Chinese Nationalists and the Allied Powers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Asian Affairs* 34, issue 3 (2003): 243-59.

② Rana Mitter, *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 (Boston, MA: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3); *China's War with Japan, 1937-1945: 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 (London: Allen Lane, 2013).

③ 齊錫生：《劍拔弩張的盟友：太平洋戰爭期間的中美軍事合作關係（1941-1945）》（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

④ 楊天石、莊建平編：《戰時中國各地區》（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楊天石、臧運祜編：《戰略與歷次戰役》（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楊天石、黃道炫編：《戰時中國的社會與文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楊天石、侯中軍編：《戰時國際關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⑤ Stephen R. MacKinnon, Diana Lary, and Ezra F. Vogel, eds., *China at War: Regions of China, 1937-1945*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⑥ Stephen R. MacKinnon, *Wuhan, 1938: War, Refugee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⑦ Franco D. Macri, *Clash of Empires in South China: The Allied Nations' Proxy War with Japan, 1935-1941* (Lawrence, K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12).

⑧ 鄭智文、蔡耀倫：《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3）；Kwong Chi Man, “The Failure of Japanese Land-Sea Cooperation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Hong Kong and the South China Coast as an Example, 1942-1945”, *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79, no. 1 (2015): 69-91；鄭智文：《重光之路：日據香港與太平洋戰爭》（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5）。

⑨ 英文版參見Tim Luard, *Escape from Hong Kong: Admiral Chan Chak's Christmas Day Dash, 1941*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1)；中文版參見陸雅達(Tim Luard)著，章昌文譯：《一九四一香港大突圍》（台北：國防部政務辦公室史政編譯處，2015）。

⑩ 英文版參見Chan Sui-jeung, *East River Column: Hong Kong Guerrillas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After*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中文版參見陳瑞璋：《東江縱隊——抗戰前後的香港游擊隊》（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2）。此外，香港大學出版社於2014年出版了英國駐澳門領事瑞福仕(John P. Reeves)的回憶錄，為研究二戰期間的華南地區提供又一重要史料。參見

John P. Reeves, *The Lone Flag: Memoir of the British Consul in Macao during World War II*, ed. Colin Day and Richard Garrett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4)。

① 有關香港戰役，詳見Tony Banham, *Not the Slightest Chance: The Defence of Hong Kong, 1941*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Oliver Lindsay, *The Battle for Hong Kong 1941-1945: Hostage to Fortun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有關戰爭期間的華籍英兵，詳見鄭智文：《老兵不死：香港華籍英兵，1857-1997》(香港：三聯書店，2014)。

② 例如陳敬堂、邱小金、陳家亮編：《香港抗戰：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論文集》(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2004)。

③ 參見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香港·長沙作戰》(東京：朝雲新聞社，1971)；George B. Endacott, *Hong Kong Eclipse*, ed. Alan Birch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Carl Vincent, *No Reason Why: The Canadian Hong Kong Tragedy: An Examination* (Ontario: Canada's Wings Inc., 1981)；Oliver Lindsay, *The Battle for Hong Kong 1941-1945*；Geoffrey C. Emerson, *Hong Kong Internment, 1942 to 1945: Life in the Japanese Civilian Camp at Stanle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8)；Lawrence Lai et al., "The Gin Drinker's Line: Reconstruction of a British Colonial Defence Line in Hong Kong Using Aerial Photo Information", *Property Management* 27, no. 1 (2009): 16-41；Lawrence Lai et al., "Location of Pillboxes and Other

Structures of the Gin Drinker's Line Based on Aerial Photo Evidence", *Surveying & Built Environment* 21, no. 2 (2011): 69-70；Franco D. Macri, *Clash of Empires in South China*；鄭智文、蔡耀倫：《孤獨前哨》。

④ 參見Ko Tim Keung and Jason Wordie, *Ruins of War, A Guide to Hong Kong's Battlefields and Wartime Sites* (Hong Kong: Joint Publishing, 1996)；Tony Banham, *Not the Slightest Chance; The Sinking of the Lisbon Maru: Britain's Forgotten Wartime Traged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6)；*We Shall Suffer There: Hong Kong's Defenders Imprisoned, 1942-45*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⑤ 陳安邦、陳安國主編：《陳策將軍紀念集》(香港：出版單位不詳，2011)。

⑥ 有關這個論點及其問題，詳見鄭智文：〈重檢香港軍事史論述：二次大戰期間的重要片斷〉，jcMotion，網上版，<http://jcmotion.tmgbook.com/index.php/tw/component/jshopping/product/view/13/23>，頁8-9。

⑦ Franco D. Macri, *Clash of Empires in South China*；Kent Fedorowich, "'Cocked Hats and Swords and Small, Little Garrisons': Britain, Canada and the Fall of Hong Kong, 1941", *Modern Asian Studies* 37, no. 1 (2003): 111-57；鄭智文：《老兵不死》。

⑧ 關於以上內容的具體考證，參見鄭智文、蔡耀倫：《孤獨前哨》。